中藥材牛黃的生產歷史及其本草藥圖所涉及的知識結構

陳元朋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提　要

牛黃的古典文本記錄史，是一個可以深究的議題。因為，就在本草文本代代相承那些有關牛黃取得的神異傳說的同時，實證性的牛黃取得事蹟也在中世以降的記錄者筆端不斷積累。然而，在博物知識的專業文本裡，「真實」仍然無法徹底代換那些傳統性的「神異」。這也就是說，儘管「殺牛取黃」的前代實證事例早已問世流布，但這藥學文本在圖繪牛黃取得方式時，描摹的卻仍是「喝迫取黃」的畫面。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博物認知：大聲喝斥並鞭笞一隻病牛，讓這隻可憐的動物從嘴裡吐出牛黃來。

藥圖當然不是藥學的全部，但這種以寫真為理想的圖繪，終究還是涵蘊了中國本草學術的知識格局，而本文以之為探究古代藥學知識結構之個案的邏輯基礎也在於此。

關鍵詞：牛黃、中醫、本草、醫療史、文化史

一、序 論

牛黃（Calculus bovis）是牛科動物牛（Bos taurus domesticus Gmelin）的膽囊結石。[1] 在中國藥學文本裡，牛黃的載錄時間最早可以上溯至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其後又在魏晉以迄近代的各種主流本草裡持續出現。[2]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方技之士使用牛黃的時間雖然甚為久遠，但對於這種藥物的產出卻始終存在著多種認知，而其中且頗不乏神異者流。

古代中國的牛黃文本記錄史，是一個可以深究的個案。因為，就在本草博物文本代代相承那些有關牛黃取得的神異傳說的同時，實證性的牛黃取得事蹟也在中世以降的記錄者筆端不斷積累。事實上，衡之當代認知，古代藥學文本之外的少數採取實例，無寧是更為近真的。然而，如斯真實，在博物知識的專業文本裡，卻仍然無法徹底代換那些傳統性的「神異」。關於此，明代的三種寫本藥學著作《本草品彙精要》、《食物本草（宮廷寫本）》與《金石昆蟲草木狀》又洵是顯例。[3] 儘管「殺牛取黃」的前代實證事例早已問世流布，但這兩部著作在圖繪牛黃取得方式時，描摹的卻仍是「喝迫取黃」的畫面。它源自於一個傳遞已歷千餘年的博物認知：喝罵并鞭笞病牛，可以讓這隻可憐的動物從嘴裡吐出牛黃來。

由於宗旨是指導臨床，在中國博物知識的文本譜系裡，本草著作的實證屬性或許還是最強的。除了言說藥物基原的文字早在西元前後就已經出現外，初唐《新修本草》還創立了被後世襲為成規的「藥圖」傳統。然而，問題也正在於此。明明是訴求觀覽者更近一步「趨真」的圖繪，偏偏又在牛黃這味藥物上傳授了「失真」的

1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廣東省藥品檢驗所編著，《中國中藥材真偽鑒別圖典》（廣州：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頁 87-88。

2 有關「主流本草」之說，請見岡西為人，《本草概說》（大阪：創元社，1977），頁 43。單就「主流本草」而言，牛黃的藥學記錄最早在成書於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中就已然載及。漢魏以下，舉凡《名醫別錄》、《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圖經》、《證類本草》、《本草品匯精要》、《本草綱目》等歷代藥學專書中皆有載記。又，宋以前藥學文本中的牛黃記錄，請見（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卷 16，頁 492-493。宋至明間的相關記錄，請見（明）劉文泰纂修、曹暉校注，《本草品匯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卷 23，頁 413-414。（明）李時珍撰、陳貴廷通釋，《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冊下，卷 50，頁 2134-2137。

3 有關這三部著作中牛黃藥圖的所載卷秩，請見：（明）劉文泰纂修、曹暉校注，《本草品匯精要》，卷 23，頁 413。（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卷 27，頁 412。（明）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臺北：世界書局，2014），頁 123。有關此三書概括性研究，請見鄭金生，〈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新史學》，14 卷 4 期（2003.12），頁 65-119。

認知，其箇中因由顯然是不能等閒視之的。[4] 本文因之以為，這或許要從知識傳統的結構上進行探索，方能較適切地回應上述的現象。

以往關於牛黃的學術研究，主要都集中在「醫學」、「獸醫學」與「畜產學」的方域裡，而其範疇則跨涉了藥學、方劑學、生物化學、獸醫病理學，以及各種人工生產技術的研發等門類。[5] 從表面上看來，當代的牛黃研究，似乎與歷史學術無關，而「以今窺古」從來也不是歷史學門所提倡的技藝。不過，由於中國古代的博物知識，始終沒有正面言說過牛黃的物性，更遑論對於其產生因由的理解，因此現代醫學、獸醫學與畜產學對於這味藥材所進行的各種探討，就格外顯得重要。事實上，對於本文而言，古今知識體系在牛黃上所體現的認知差距，其價值並不在於科學、抑或是對錯與否；相反的，知識構成方式的不同，才是旨趣之所在。

全文共分三節。首則要對當代中國的牛黃研究與生產事業進行綜述，其目的除了在藉今日的認知以說明牛黃的物性外，也在為本文後續的研討，建立一種知識構成方式上的對照組。其次，要探討的是明代兩部寫本本草裡的牛黃藥圖，包括它們的形成過程與構圖傳統。此外，歷代之於這種藥物的相關載記，也將統歸在這部份一併加以敘述。最後，本文將從文本傳統的角度談起，說明牛黃這個個案藥物所展現的知識結構特徵，以及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二、當代中國的牛黃生產小史

誠如人類學家 Appadurai 所提示的：物的價值，通常不來自於物的天然質性，而是取決於物品交換過程中，物的「難以獲得」之程度。[6] 牛黃價值的高昂，其原因正在於此。事實上，不獨是今日的中國，早在西元三世紀時，陶弘景（456-536）就曾在他的《本草經集注》裡提到牛黃在南朝齊梁之際的價格是「五六千至一

4 關於傳統本草中藥圖的設置作用，曹暉有扼要的論述，請見曹暉，〈《本草品彙精要》藥圖考察〉，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匯精要》，附錄 1，頁 751-754。

5 有關當代中國牛黃研究的成果，有幾篇回顧論文可以參考，它們分別是：鮮義坤，〈近年我國牛黃培殖概況〉，《特產研究》，1986 年 1 期，頁 15-18。邢振貴等，〈培育牛黃開發簡結〉，《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9 年 2 期，頁 80-88。張啟明，〈開拓牛黃新資源的研究概況〉，《中醫藥資訊》，1990 年 4 期，頁 1-4。王莉萍，〈體外培育牛黃研究概況〉，《醫藥導報》，2007 年 11 期，頁 1334-1336。郝滿良，〈我國牛黃研究進展〉，《河北農業大學學報》，1994 年 2 期，頁 83-87。楊明珍，〈中國牛黃 43 年（1949-1992 年）研究動態〉，《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1996 年 1 期，頁 27-35。又，本文正文中所參考的各種當代研究，將在後續行文中隨附臚列。

6 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95-140.

萬錢」，他還因之寫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的評語。[7]

牛黃來自於牛的膽囊結石。換言之，除非是得了膽結石的病牛，一般牛隻的體內，是無法產出牛黃的。[8] 例如，日本學者在 1970 年代，曾經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牛隻普查，在總數 61,428 頭牛隻身上，只發現 129 頭牛生有牛黃，產黃率僅 0.21%。[9] 而在中國方面，袁惠南與張啟明在 1991 年發表的報告裡指出，陝西省農牧單位利用 B 超進行牛隻普查後，發現該省牛隻的自然產黃率極低，只有 0.68%。[10] 至於李富育，余伯貴在搜集四川省通江縣 6,784 頭牛隻的解剖資料後，雖然得到了較高的產黃比率，但也僅有 2.66%。[11] 可是，「天然牛黃」（Natural Calculus Bovis）的產量雖然如此之少，但人們對於這味藥物的需求量卻極大。而這種供需上的窘迫狀態，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由「陝西省藥材公司」與「陝西省畜牧獸醫總站」專業研究人員所提出的一項數據裡，就被體現得十分清楚：該省年收天然牛黃不足 5 公斤，但每年僅是內需就高達 250 公斤至 400 公斤之多。[12]

「天然牛黃」在供需上的極度不平衡，其實並非當代才存在的問題。11 世紀中葉，蘇頌就曾經在《本草圖經》裡，提醒觀覽者要提防「此物多偽」。[13] 事實上，贋品的普遍存在，正說明著真品的難以獲致。然而，一直到清代，贋品牛黃的廣泛流通，也還是個令使用者困擾不已的問題。關於此，《紅樓夢》第八十四回裡的情節就是個極具說服力的例證：那位替「巧姐兒」診病的醫者，在向賈母陳述需要牛黃合劑時，說的便是「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14] 小說當然不是史實，但小說仍能反映世況，而古代真品牛黃難得一見的事實，在此可說被體現得很是清楚。

---

7 （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92。

8 關於牛黃產出的牛體條件，本文參考的是魏志傑，〈天然牛黃形成規律初探〉，《中國牛業科學》，1991 年 1 期，頁 71-72。李富育、余伯貴等，〈通江縣天然形成牛黃的調查報告〉，《中國獸醫雜誌》，1993 年 11 期，頁 23-25。

9 楊明珍，〈中國牛黃 43 年（1949-1992 年）研究動態〉，頁 27。

10 袁惠南，張啟明，〈我國牛體培植牛黃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科學通報》，1990 年 21 期，頁 1606-1607。

11 李富育、余伯貴等，〈通江縣天然形成牛黃的調查報告〉，頁 23-25。

12 白書坪、蒲先琦，〈陝西省牛體培育牛黃的試驗研究與技術操作〉，《畜牧獸醫雜志》，1984 年 3 期，頁 4-7。

13 關於當代藥材市場中的牛黃贋品，可以參考孔增科，〈貴重中藥十年偽品概況〉，《時珍國藥研究》，1996 年 2 期，頁 122-125。又蘇頌的言論，見於（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 433-434。

14 （清）曹雪芹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第 84 回，頁 1327。

根據郝滿良與楊明珍的研究，牛黃是包括「安宮牛黃丸」、「牛黃清心丸」、「牛黃鎮驚丸」、「六神丸」、「牛黃上清丸」、「牛黃解毒丸」等在內多達 170 種中醫方劑的主要配伍素材。[15] 此外，由於 1949 年以後，中國主要醫療保健體系的建構，走的是中西醫結合的發展路徑，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引領與指導了社會大眾的醫療衛生習慣。[16] 因此，天然牛黃難以定量足量獲取的障礙，也就成為當代中國醫藥事業上的一大課題。

1949 年以來中國學界對牛黃進行的研究，本身就是個很值得投注目光的知識構成案例。總體而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一個：此即「天然牛黃」的低產問題。事實上，參與這場知識開發活動的學術門類很多，一開始相互之間也未必存在著橫向的統合，但在彼此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各學門的研究成果，透過現代資訊流通管道所提供的便利，於是乃得以產生相互借鏡的作用。此中，最先交出成績單的，當推以化學、藥學為研發主體的「人工牛黃」（Artificial Calculus Bovis）。[17] 由於日本學者在 1940 年代的定量研究，已經發現天然牛黃的最主要組成元素是膽紅素、膽固醇、膽酸鹽、卵磷脂、脂肪，以及一些含有鈣、鎂、鐵的無機鹽。[18] 因此在國內天然牛黃供需吃緊的現實狀況下，「國營天津製藥場」的研究人員，乃在 1955 年開始研究人工合成牛黃的可行性。根據當時主導其事的唐德？的說法，當時的構想是：既然牛黃的主要成份都可以在牛膽汁裡提取，那麼如果再按天然牛黃中各成分的此例加以配合，必然也可以製造出與天然牛黃相同的牛黃。[19]1957 年，合成的人工牛黃在通過動物實驗之後，乃正式投產。

儘管 50、60 年代關於「人工牛黃」的報導，大多宣稱其成份與功效與「天然牛黃」無異。但是，在經歷長時間的臨床運用後，第一線的治療者們卻還是發覺了兩者間的差異。許多臨床報告都指出，「人工牛黃」在鎮靜中樞神經、抗驚厥、解熱、抗炎、護肝、利膽、抗氧化、增強自體免疫力，乃至於強化心肌收縮等療效

15 郝滿良，〈我國牛黃研究進展〉，頁 83。楊明珍，〈中國牛黃 43 年（1949-1992 年）研究動態〉，頁 27。

16 鄭金生，〈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發展的歷史必然〉，《中國中醫藥科技》，1994 年 3 期 ，頁 36-37。

17 楊洪武，〈人工牛黃的品質分析研究〉，《遼寧中醫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頁 50-51。

18 西村正也、森良雄，〈漢藥「牛黃」の化學的組成に就て〉，《臨床獸醫學新報》，16 期（1940.5），頁 44-47。又，西村氏的研究，其後又有學者為其深化，見志甫伝逸、高林昇、東宏俊，〈和漢藥成分の分析化學の研究（第 1 報）牛黃中のビリルビン複合體の定量について〉，《藥學雜誌》，83 卷 9 號（1963.9），頁 882-885。

19 唐德瑄，〈我們是怎樣合成牛黃的？〉，《上海中醫藥雜志》，1957 年 11 期，頁 12-14。

上，無法完全達到「天然牛黃」的水準。[20] 此外，在一份由「國家中藥品種保護審評委員會」發布的文獻裡，還提及「人工牛黃」在製程與原料來源上，也存在著許多難以控管的人為風險。[21] 因此，儘管時至今日，「人工牛黃」仍然是國內各種牛黃成藥的主要原料，但學界尋求更接近「天然牛黃」成份與功效的行動，卻也在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開展。

自 1970 至 1990 年這廿年間，中國牛黃研究有極具突破性的發展。在「天然牛黃」仍然價高難得，而「人工牛黃」又無法全面代用的大背景之下，學界的思考方向乃轉向「培植牛黃」（Cultivated Calculus Bovis）。[22] 這是一種先在牛隻膽囊內植入人工核心，再調控牛隻生理結構以誘發牛隻的膽結石病變，最後再以手術取出牛黃的新技術。[23] 值得一提的是，「培植牛黃」的生產流程看似易簡，但它實際涉及的面向卻極其複雜。根據在 1974 年至 1976 年間研發這項技術的「廣東省海康縣藥品公司」所提出的報告，舉凡天然產黃牛隻的品種、性別、年齡，所居處的自然環境、畜養方式、生理與病理特徵；人工核心的材質、形狀；致病菌種的選取、培養與接種技術；植入核心與取出牛黃的外科手術標準流程，乃至於「培植牛黃」的藥學分析標準等，都是必須考量的因素。[24] 可以清楚的看見，作為新技術基礎的知識門類十分廣泛，除了以往「人工牛黃」所涉及的化學與藥學之外，還包括了畜產學，以及獸醫學門內的病理學、生理學、細菌學、生物化學，生物技術，以及外科學、麻醉學等分支專業。[25]

「培植牛黃」的技術，自 1970 年代中期問世後，獲得了官方與民間的高度重

20 趙豔紅，〈牛黃及其代用品的藥理作用及臨床應用〉，《軍事醫學科學院院刊》，2007 年 2 期，頁 175-178。陸基宗，〈牛黃及其三種代用品〉，《家庭中醫藥》，2008 年 3 期，頁 64。王春來，〈牛黃及其代用品概述〉，《實用中醫藥雜誌》，2010 年 10 期，頁 732-733。

21 董潤生、韓白石、郝明紅，〈人工牛黃新標準的實施與管理〉，《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1996 年 1 期，頁 51-53。

22 何英，〈人工培植牛黃技術的現狀及展望〉，《黑龍江畜牧獸醫》，1990 年 11 期，頁 38-40。劉振山、鄭玉泉，〈牛體人工培殖天然牛黃技術〉，《生物學雜誌》，1991 年 6 期，頁 23、30。

23 董建平、唐濟民、王積中，〈手術摘取人工培植牛黃 300 例的體會〉，《黃牛雜誌》，1994 年 71 期，頁 130；153-154。

24 林如忠，〈牛黃的「人工培殖」與研究〉，《中藥材》，1980 年 3 期，頁 19-23。

25 林卡民，〈牛黃培殖實驗初報〉，《廣西農業科學》，1981 年 12 期，頁 40-42。武駿秀、喬景新、鄭洛、周玉，〈牛體培育牛黃試驗報告〉，《山西農業科學》，1983 年 9 期，頁 28-30。馬成林、王振文、劉正民、田玉垚、唐瑞，〈牛的膽囊手術〉，《中國獸醫雜志》，1980 年 6 期，頁 34。賀春陽、范桂蘭、關紅、李培鋒、張福仁、馬蓓，〈天然牛黃與培育牛黃的掃描電鏡觀察〉，《藥學學報》，1988 年 12 期，頁 34。林世琛，〈人工培植牛黃的研究動向〉，《青海畜牧獸醫雜志》，1987 年 1 期，頁 31-35。

視，許多學術科研單位都開始投入這個新技術的試驗與研究，而相關的推廣書籍與電視節目也發揮了普及技術的功能。許多報導都指出，「培植牛黃」不但在臨床功效上較「人工牛黃」更接近「天然牛黃」，而且在培育其間內，牛隻的使役、放牧、生育和增重都不受影響，因此十分適合在農村推廣。不過，這種以誘病為生產原理的「培植牛黃」，仍然有其局限性。唐廣文的研究就指出，產量不穩定，以及所產牛黃膽紅素含量偏低，是這項技術的普遍性問題。[26] 而「新華社」的報導也指出，儘管「培植牛黃」在市場上的價格接近天然牛黃，但由於其技術畢竟還是要在牛體內接種與手術取出，一般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形成結石，且獲得優質成品的機率有限，因而難以形成規模化生產，以故在市場上的佔有率微乎其微。[27]

「人工牛黃」的生化組合太過簡單，而「培植牛黃」又有著各種來自於植體與產能上的障礙。因此，80 年代乃有「體外培植牛黃」的研發。[28] 其中，被稱作是「體外模型合成牛黃」的最新技術，主要是在以往各學門對於牛黃研究的基礎上，又結合了西醫學、中醫學、生物工程學、流體力學等專門知識，模擬出一套近似於「天然牛黃」形成過程的生產機制，而所得成品經過精密檢驗，其組成與天然牛黃有 97.6% 的相似度。[29] 根據發明者「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蔡紅嬌教授的說明，這個機制的建立，並非一蹴可及，從構想到實踐總共耗時 15 年之久。她的研究團隊先是運用生物發酵工程和化學、物理學等方法改變了正常牛膽汁的理化性質，消除自然存在於生物膽汁內阻滯膽結石形成的因素。之後，又再藉由流體力學的原理，研製了一種具有「三維轉動裝置」的「牛黃培育機」，並經歷 600 多次的實驗室模擬，最後才得到令研究團隊滿意的牛黃產品。[30] 而根據《股市動態分析》這本商業雜誌在 2010 年的報導，這個「體外模型合成牛黃」技術的專利權，後來以人民幣 2,850 萬元的高價轉讓給「武漢建民大鵬藥業」，並正式設廠投產。[31]

---

26 唐廣文，〈提高人工培植牛黃產量和質量的探討〉，《中國獸醫雜志》，1988 年 11 期，頁 18-19。

27 張曉松，〈何謂人工牛黃、培植牛黃和體外培育牛黃〉，《新華網》，2004 年 3 月 31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62623d0100qmb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6 日）。

28 郝滿良，〈我國牛黃研究進展〉，頁 86。楊明珍，〈中國牛黃 43 年（1949-1992 年）研究動態〉，頁 27。

29 王春來，〈牛黃及其代用品概述〉，頁 732。

30 中國新藥雜志社，〈體外培育藥用牛黃的科技工作者——記中國藥學發展獎中藥獎獲得者蔡紅嬌教授〉，《中國新藥雜志》，2004 年 11 期，頁 1068。

31 中國中醫藥資訊雜誌社，〈體外培育牛黃引起中藥企業關注〉，《中國中醫藥資訊雜誌》，2004 年 4 期，頁 302。《股市動態分析》研究部，〈武漢健民：體外培植牛黃的王者〉，《股市動態分析》，2010 年 3 期，頁 39-40。

如果從「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角度來進行觀察，那麼當代中國牛黃研發事業的每一個階段，其實都可以視作是一種「文化史」的史料。事實上，同樣是對於一種物質的認知與運用，今日的牛黃研究與生產，也並沒有完全悖離自古以來的知識傳統。70 年來，不論是代用，亦或是模擬，研究者們視「天然牛黃」為圭臬的認知取向，與古代本草方技之士恪求「道地藥材」的知識傳統相較，並無甚差異。[32] 此中，比較值得注目的，還是知識的擴張方式，以及新認知在既有知識結構裡的處遇。

一個很鮮明，卻又很可能被忽略的事實是：在僅僅不及百年的短暫時間裡，中國學術界對於牛黃所累積成的知識，不論在深度或廣度的哪一個層面，竟然都遠邁過去兩千年來博物之士的所得。而本文以為，牛黃知識在今日的積累理路，其實頗有些類似「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之「物質文化研究」（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所提及的「物的社會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之構成脈絡。這也就是說，當代學術界之所以會在牛黃這種物質上投注以極高的關懷，主要原因還在謀求解決社會醫療活動中該物質所被賦予的那種令人困擾的高昂價值，而各學門之所以能夠介入這個追求低價的活動，在意義上其實也可以視之為是一種牛黃與人類社會所進行的「政治過程」。[33] 這點是很值得留意的。換言之，此處所謂的「政治過程」，可以視為是現代學術對於高價天然牛黃提出對策的一種活動。由於牛黃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裡，引發了諸如需求、高價、贗品、乃至於代用品等各種層面的問題，於是乃有各學門介入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牛黃這個物質，當代專業知識間之所以能夠相互借鏡其研究所得，甚至因此而擴張了既有的認知縱深，主要還是各種知識流通機制與學術倫理的共同運作結果。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今日中國的相關研究，從來不是哪一個特定學門的專利，而每一個學科對相關問題所提出的對策，其實又都在解決一個或數個人類社會與這種物質間所遭遇的難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對策，是可以相互流通的，在知識的言說權上，霸主並不存在。

三、「喝迫得黃」與傳統本草文本裡的牛黃藥圖

在明代文俶（1595-1634）的《金石昆蟲草木狀》裡，有一幀題為「牛黃」的

32 有關「道地藥材」的醫史研究，請見鄭金生，〈道地藥材的形成與發展 I〉，《中藥材》，1990 年 6 期，頁 39-40；鄭金生，〈道地藥材的形成與發展 II〉，《中藥材》，1990 年 7 期，頁 43-45。

33 Arjun Appadurai,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95-140.

圖繪。[34] 與現代藥學專書不同的是，文氏之圖，畫的並不是牛黃這味藥物的外觀，而是以圖 1 這般的樣貌來呈現其主題。值得注意的是，文俶出身非常，她是明代大畫家文徵明（1470-1559）的玄孫女，其父是晚明編纂《畫史會要》、《國朝畫徵續錄》的著名畫家文從簡（1574-1646），而其夫婿趙靈均（1591-1640）則深黯文字之學。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1582-1664）對文俶在繪畫上的造詣十分推崇，曾經盛讚其畫功為「本朝獨絕」。[35]

由於趙靈均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為《金石昆蟲草木狀》一書所撰寫的敘文中，曾經明確指出妻子文俶的圖繪，乃是參考宮廷密藏的本草藥圖而來，因此我們大概可以推斷這部載圖共達 1,315 幅的畫集，其實是臨摹而非寫生。[36] 而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則認為，這個趙靈均筆下的「內府本草」，正是明孝宗（1470-1505）時期那部由「太醫院判」劉文泰等奉詔編纂的《本草品彙精要》。[37]

在醫史文獻學的領域裡，《本草品彙精要》的處遇一直很尷尬。它雖然是北宋以降「主流本草」的最終之作，且其彩繪藥圖之精美程度也迥非其它本草所能比擬，但由於其在實際藥學上並無嶄新貢獻，再加上劉文泰本人後因醫療疏失而導致孝宗晏駕，以故該書在明代一直是部深藏宮中的未刊禁書，而其在本草學術上的評價也始終很低。[38] 根據學界的研究，該書一直到清康熙年間才弛禁，雖然仍未鏤版刊行，但也形成了 16 種流傳於世的抄本。[39]

圖 2 取自《本草品彙精要》的「柏林本」。[40] 曹暉曾藉由避諱字，判斷這個本子

34（明）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頁 123。

35 關於文俶的出身、家庭狀況，及其在藝術史的評價，請見曹暉著，〈《本草品彙精要》之藥圖萬歷傳摹本《金石昆蟲草木狀》的考察〉，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頁 728-731。又可參考臺北「世界書局」出版之《金石昆蟲草木狀》，頁 1-6 的〈編者序〉。

36 關於文俶臨摹宮廷密藏本草藥圖之事，見於其夫趙靈均所撰〈金石昆蟲草木狀敘〉，該文載在臺北「世界書局」出版之《金石昆蟲草木狀》，頁 11-15。

37 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 439。

38 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 72-74。

39 有關《本草品彙精要》的研究，要以曹暉用力最深。本文此處參考的是曹暉，〈我國古代最後一部未刊藥典《本草品彙精要》的編纂及其外傳〉，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頁 3-18。

40 雖然曹暉校注的《本草品彙精要》，原本即有該書「羅馬本」的牛黃藥圖，但由於出版社印刷不清，且為黑白，故本文乃改採「柏林本」的彩色藥圖。不過，這兩個本子的藥圖在結構上並無差異。劉文泰纂，王世昌等繪，《本草品彙精要》，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彩繪寫本（柏林本）圖版取自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官網，網址：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46157326&PHYSID=PHYS_2444&DMDID=DMDLOG_0033，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6 日。

的抄寫年代不會早於乾隆年間（1736-1795），並指出其流傳至德國的時間約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41] 可以清楚看到的是，這個抄本所載錄的牛黃藥圖，雖然未若《金石昆蟲草木狀》中的同類藥圖來得細膩，但其圖旨、結構、方位，以及人牛的相對位置則完全一致，雖然無法判定各自臨摹的板本為何？但至少可以確認兩者應該還是屬於同一祖本的系列抄本。

明代還有另外一部寫本本草，其藥圖即如圖 3 所示，也有著表述方式完全類同於上述兩例的圖繪，此即被研究者命名為「宮廷寫本」的《食物本草》。鄭金生的研究指出，這部不著撰人的食物類本草，在文字內容上與當時流行在民間的《食物本草》悉同，但其 467 幀藥圖的圖繪風格卻極類似《本草品彙精要》，而少數藥圖甚至像是出自同一手的摹繪。[42] 再根據該書「華夏出版社本」書前〈序文〉的考證，這部裱裝精美，藥名甚至以「金泥」書寫的璜貴寫本，其撰繪時間應該接近於《本草品彙精要》的纂成時間（即明弘治十八年，1505）；至於其作者，則很可能就是以劉文泰為首的那群醫官們。[43]

牛繫木、人執鞭、盆納黃，明代三種寫本本草所描繪的牛黃藥圖，其實藍本早在 6 世紀時便已形成。陶弘景在他的《本草經集注》裡如是寫道：

> 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承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皆就膽中得之。[44]

這是中國歷代本草裡第一次述及牛黃的取得方式。陶氏之說，重點有二，一是「盆水」承接墮自牛角中的牛黃，其次則談到時人大多從牛膽中獲得牛黃。很明顯的，陶弘景在述說牛角產黃的神異故事時，並沒有漏落實證性的牛黃取得方式，他很老實的說明瞭時人多在牛膽中發現牛黃的事實。然而，在唐代的《新修本草》裡，同樣一件事，卻有了如下的擴張：

> 牛有黃者，必多吼喚，喝迫而得之，謂之生黃，最佳。黃有三種：散黃粒如麻豆；慢黃若雞卵中黃糊，在肝膽；圓黃為塊，形有大小，並在肝膽中。[45]

41 曹暉，〈我國古代最後一部未刊藥典《本草品彙精要》的編纂及其外傳〉，頁 12。
42 請見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 424-425。
43 請見墨公，〈影印《食物本草》彩繪本序〉，收入（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頁 1-4。
44（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92。
45（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92。

這段記載同樣可分兩部份來看。其中，說明牛黃產於肝膽的文字，大概可以視之為是實證性的描述，其與今日人們所認知的牛黃取得方式相較，並沒有太大的出入。而另一部份有關「牛有黃者，必多吼喚，喝迫而得之」的記錄，則明顯是由南朝陶弘景的集注文裡衍生出來的。此處，還特別要注意的是《新修本草》在「喝迫而得之」後的記注語，蘇敬等編纂者特別提醒人們，這種方式取得的牛黃，是最好的牛黃。[46]

大聲威逼已經因為身體不適而發出哀鳴的牛隻，以使其吐出最佳牛黃的中古時期本草記錄，其實就是一種對於「道地藥材」的強調與申明。這樣的看法，在稍後的北宋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繼承和強化。首先是掌禹錫（990-1066）等在《嘉祐補注神農本草經》裡所增添的資料：

> 吳氏云：牛黃，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47]

所謂的「吳氏」，指的是《吳普本草》，這是一部在 3 至 6 世紀間廣泛流傳於世的藥學專著，其作者吳普據稱還是華陀的弟子。[48] 或許是由於陶弘景與蘇敬，都沒有在他們的著作裡，明確言說現實中最常見的「肝黃」的由來，因此掌禹錫乃以附注的形式，先是認可了「生黃」的存在，此外又添加了吳普的意見，指出牛黃其實是一種會在牛體中遊行的物質，牛生時黃在角，牛死則會遊移至肝中。其次，則是蘇頌（1020-1101）在《本草圖經》裡所匯整的記錄：

> 凡牛有黃者，毛皮光澤，眼如血色，時複鳴吼。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墮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初在心中如漿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或皂莢子是也；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皆不及喝迫得者最勝。[49]

除了重申「喝迫」所得「生黃」在藥用價值上的無可取代性外，這位在十一世紀號為博雅的君子，一方面在文字記錄上延續了六世紀以來有關「喝迫」技術的執行細節，二方面又別添續了像是「毛皮光澤」、「眼如血色」、「好照水」等「有黃之牛」

46（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92。
47（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92。
48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 156-159。
49（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頁 433-434。

的鑒別標的。而更值得我們投注目光的是：除了文字之外，蘇頌的《本草圖經》還提供了藥圖。

儘管缺了執鞭恫嚇之人，但像是圖 4 所示北宋中期《本草圖經》裡的牛黃藥圖，仍然延續了六朝以來那種「以盆水承而吐之」的「生黃」取得辦法。換言之，這幅圖繪意欲標明的其實仍是該種藥物的「道地」品類。再就該書輯校本所載宋廷奏敕中有所謂：「繪畫成圖」一語來研判，最早奉呈給仁宗皇帝（1010-1063；又《圖經》上呈時間在宋嘉祐三年，即 1058 年）御覽的本子，其藥圖應該也是如同明代寫本本草那樣的彩繪圖譜，只是在命令官方「校正醫書局」鏤板刊行時，才以版畫的形式加以呈現。[50]

由於北宋時期唐慎微所編纂的那部《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在其問世後的五百年間始終都是傳統中國藥物知識的主流文本，而該書在藥圖方面又基本襲取了《本草圖經》的內容。[51] 因此，像是《本草品彙精要》這樣的宮廷藥學寫本，為何會採取「人鞭牛」、「盆承黃」之類的構圖形式，其理由就不言可喻了。因為，那正是古代藥學文本傳統中，取得最佳牛黃的惟一操作技術。關於此，趙靈均在觀覽妻子文俶所繪藥圖後的第一反應，又洵是顯例。事見趙著〈金石昆蟲草木狀序〉，其云：

> 此金石昆蟲草木狀，乃即今內府本草圖彙秘笈。……與今世盛傳唐慎微氏證類圖經，判若天淵，等猶玉石。[52]

趙氏持之以對比妻子畫作精麤的文本，正是北宋《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所刊載的「《圖經》牛黃圖」，是則明代寫本本草所載牛黃藥圖所從屬的本草傳統，居此亦可見一斑。

有關明代寫本本草中，牛黃藥圖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其所涉及的古代藥學認知，已概如上述。然而，啟人疑竇的是，既然六世紀時的陶弘景，已經直承人們大都是從牛膽中獲得牛黃；那麼，宋明之間的藥學家們，又為何要以「喝迫得生黃」來作為藥圖的主題？事實上，證之以今日的牛黃研究史，生成於膽囊與膽管之中的牛隻結石，又焉能從口中吐出？而一種體質訛誤，明顯無法與實證經驗相對榫的認知，又怎能在千餘年的漫長歲月裡，不僅不受人質疑，亦且還成為後世專業文本所

50 該奏敕載在（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頁 3。
51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頁 412。
52（明）趙靈均，〈金石昆蟲草木狀敘〉，見《金石昆蟲草木狀》，頁 13。

標舉的道地藥材？凡此種種，由於事涉古代博物知識的結構與變遷，本文請以下節再續論之。

四、牛黃藥圖與「事必稽古」的本草知識結構

儘管歷代方志有關牛黃生產的土貢記錄極為有限，而「食貨」一類的史志中又常見古代中國自域外進口牛黃的事蹟。但許多事例都顯示，古代庶民對於取得牛黃的相關知識，似乎並非全然無知。像是宋代就有三則極為明顯的案例，其一是北宋董弇在《閑燕常談》中所提及的一件時事：

> 宗汝霖（即宗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歎呼感戴者。[53]

其二是《宋史》所載北宋徽宗年間，翟汝文（1076-1141）奏諫「牛黃貢」事：

> 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密。」上從之。[54]

其三則見載於南宋洪邁的《夷堅志》中：

> 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甚驚，視疑是牛黃。[55]

這三則史料的重要性都在於人們的反應。北宋徽宗年間的萊州農民，為了供應官方科買牛黃，最先的反應就是「競屠牛以取黃」。而同一時段的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則在諫章裡暗示只有死牛方能取黃。至於南宋時期四川恩州的張姓屠牛者，則是一見屠體牛肝有異物迸出，立刻就判斷是「牛黃」。值得注意的是，倘若萊州百姓缺乏牛黃無法「生取」的知識，誰又會輕易屠宰農業社會的重要畜力來源？而

53（宋）董弇，《閑燕常談》，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5），冊 84，頁 332。

54（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 11544。

55（宋）洪邁，《夷堅志》（臺北：明文書局，1994，涵芬樓藏版），丁志，卷 16，〈牛舍利塔〉，頁 3-2。

牛黃倘能「生取」，地方官又怎能有「牛失黃輒死」與「非所以惠農」的言論？而屠戶若非知曉牛黃常出的位置，又何至於會一見屠體肝區有異狀，就油然而生此是牛黃之聯想？

就史料的真實性而言，上述兩則北宋時期的記載，談的是地方官實實在在的惠民奏議，沒有造假做偽的必要。而南宋洪邁筆下的故事，雖然未必真實，但其涉及牛黃的部份既非主題，且《夷堅志》又向以反映是時日常生活而受到史家的重視，因此也無需因其屬於說部者流就棄而不取。此中，比較值得留心的，還在資料所座落的時間點。尤其是兩則北宋徽宗時期的記載，雖然或許要較唐慎微最初編纂《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的時間晚些，但這種源自於實際經驗的認知，應該已在民間存在一定的時間，但卻全然沒有引起北宋以迄明初任何一位本草博物之士的注意，這實在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

在中國本草藥學的文本發展歷史上，李時珍（1518-1593）的《本草綱目》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其前，藥學文本的主流，是北宋以降那種以《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作為主流學術文本的時期；其後，則《本草綱目》影響力日益深刻。[56] 而如果李時珍以前的本草藥學文本，沒有給予那些存在民間已久的牛黃起取事類更多的注目，那《本草綱目》又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57] 考之該書牛黃項下的「發明」文，李時珍是如此敘述他個人的看法：

> 牛之黃，牛之病也。故有黃之牛，多病而易死。諸獸皆有黃，人之病黃者亦然。因其病在心及肝膽之間，凝結成黃，故還能治心及肝膽之病。……按宋史云：「宗澤知萊州，使者取牛黃。澤云：『方春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流行，牛無黃矣』。」觀此，則黃為牛病，尤可徵矣。[58]

這段文字，可說是近代以前，中國藥學家們在諸多由他們所提出的有關牛黃的知識中，最接近今日學術認知的敘述。在此，李時珍確認了牛黃與牛隻病態之間所存在的必然關係，並指出凡是動物，包括人類在內，都可能因病而「有黃」，而這個黃的生成部位概在「心及肝膽之間」，乃是一種由疾病「凝結」而成的物質。

---

56 岡西為人，《本草概說》，頁 43-44。

57 學界對於《本草綱目》的論述極多。其中，鄭金生對於李時珍在該書中所採行的研究考辨方法，有詳盡獨到的見解。請見鄭金生，〈試談李時珍的本草考辨方法〉，《藥學通報》，1983 年 10 期，頁 7-11。

58（明）李時珍撰、陳貴廷通釋，《本草綱目通釋》，頁 2135。

由於「牛之黃，牛之病也」的認知，以及「其病在心及肝膽之間」的判斷，在漢魏以迄明代的藥學文本中並無確鑿定論，再加上李時珍在論述中引及了《宋史》中有關宗澤為民抗拒牛黃科買的簡略記錄，因此可以肯定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裡的「發明」，確實是受到上述宋代官民有關牛黃取得史實的影響。不過，即便是如此，李時珍還是沒有正面質疑「喝迫得生黃」的古典認知，他仍然在《本草綱目》的牛黃「集解」文裡，依次引錄了《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圖經本草》裡的「喝迫」敘述。實證經驗的吸納，並沒有開啟李時珍對於「生黃」的進一步「發明」。

《本草綱目》對於「生黃」與「喝迫」的沉默，在中國古代牛黃知識的建構過程裡，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像是汪昂（1615-1694）的《本草備要》、吳儀洛（1704-1766）的《本草從新》、楊時泰的《本草述鉤元》（1833）、張秉誠的《本草便讀》（1887）等清代藥學文本，在述及牛黃這味藥物時，所襲用的就都是李時珍的看法。[59] 事實上，這樣的認知傳播，也並不限於藥學家而已。就以徐珂（1869-1928）這位清末民初的博學之士為例，儘管並非醫家，但他那部號稱匯聚清代朝野軼事遺聞的《清稗類鈔》，在敘及牛黃一物時，仍然取的是古代藥學文本的知見，其論述的結構基本也與李時珍無甚差異。[60]

追溯人們取得牛黃的技術史，可以覘見中國古代博物知識的構成方式。而鄭樵（1104-1162）則從文本特徵的角度上，提供了相關的探索途徑。《通志．校讎略》云：

> 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慎微已收入《證類》。……李氏《本草拾遺》、《刪繁本草》，徐之才《藥對》、《南海藥譜》、《藥林》、《藥論》、《藥忌》之書，《證類本草》收之矣。……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61]

在鄭夾漈所說的「雖亡而不亡」之書裡，本草是個大宗，這主要還是得力於這種文本類型自六世紀以來的那種「後書包夾前書」的獨特編纂方式，而陶弘景則是其創

59 凡此諸書之相關論述，分別如右所載：（清）汪昂著、謝觀、董豐培評校，《本草備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頁 245。（清）吳儀洛，《本草從新》（香港：上海印書館，1977），頁 252。（清）楊時泰，《本草述鉤元》（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1958），頁 626。（清）張秉誠，《本草便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8），頁 105。

60（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567-5568。

61（宋）鄭樵，《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頁 832。

始者。總體而言，中國本草自《本草經集注》以下，凡是由國家之力纂修者，又或是私人所編之大型藥學專書如《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本草綱目》等，無不遵循此一撰著原則。事實上，當代許多醫史文獻學家，也時常引用鄭樵的這段敘述，並以之說明古代藥學知識得以不絕如縷地流傳至今的主要原因。

就古代藥學文本保存而言，南宋鄭樵所揭櫫的本草體例特徵，固然有其不易的貢獻。但這種「後書包夾前書」的模式，究竟會為整體知識結構帶來何種形式的影響，學界卻很少有人論及。許多研究都側重「後書糾謬前書」的面向，於是直指傳統本草藥學文本為實證的、科學的、進步的。然而，儘管像是陶弘景、蘇敬等中古藥學專家，都聲稱他們的著述原則是「研括煩省」、「無稽必正」，而出於他們之手的文本也確實在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落實。[62]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包綜諸經」之餘，在「考其同異」之際，這些藥學專家同時也在進行「精粗皆取」、「無復遺落」的工作。[63] 事實上，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定群言之得失」只是一種理想、一種大方向，它的的確確體現在部份藥物的認知之上，但卻絕非通相。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藥物知識的文本編纂上，「無稽必正」與「無復遺落」，或許還是一種在理論上看似順理成章，但在技術上卻又隱含矛盾的訴求目標。關於此，蘇頌的〈本草圖經序〉，就是很好的案例，其云：

> 臣頌既被旨，則裒集眾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註，以足成文意，註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收采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生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64]

從《本草圖經》的原文看來，引文中所提及的「裒集眾說」，除了新近為了編纂圖經而由帝國各地搜集奉呈的藥物寫生與藥學知識外，還包括了前代藥學古典所傳承的認知。然而，藥圖所畫輪廓難辨的，要參考古人舊說：藥物的寫生及田調與舊說

62 這種宣稱俱見於《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所載之〈陶隱居序〉、〈唐本序〉。詳請見（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6。

63 詳請見（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4-6。

64 （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頁 1-2。

迥異的，要古今並存：有分佈與品種相關問題時，還要從古典裡來謀求發明。而從表一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古人之說，其實是《本草圖經》在考訂藥物知識時的經緯，而非其糾謬的對象。就這一點看來，這部著作裡的牛黃藥圖，之所以會成為後世「喝迫得生黃」形象的始作俑者，若非是出於「古今並存」的考量，就是「參用古今」後的結果。

表一　《本草圖經》編輯原則簡表

資料類型	考訂原則
1. 一物而雜出諸郡者	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
2. 同名而形類全別者	
3. 外觀與舊說相異者	古今並兼存之
4. 描述不清者	援舊註，以足成文意。 註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
5. 生出郡縣	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
6. 古今收采時月有不同者	兩存其說
7. 生於外夷者	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

有些學者指出，中國傳統醫學典籍，在漢宋之間，曾經歷了一連串的「正典化」過程，亦即經由重新編輯、命名、注解舊有經文來重建該學科的秩序與權威。[65] 本文基本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六朝以迄北宋的主流本草編纂工作，原本就是在建構一種以東漢《神農本草經》為主體的藥物學權威。不過，本文同時要指出的是，在本草藥學文本的方域裡，中世以來的「正典化」的過程，雖然和醫理與脈學類同，但其內涵卻不能專以「重訂」或「注釋」概論。事實上，唐宋時期參與修撰本草的人士，雖然也透過定型化的體例，意欲藉由古典文本的「正典化」來取得知識的言說權，但在對於前人錯誤認知的糾謬上，他們卻也交出實際的成果。[66] 換言之，這個時期的藥學文本編纂者，並非一昧盲從古典，他們終究還是饒富懷疑精神的專家。然而，為什麼如此素質的博學之士，還會對像是牛黃之類藥物的相關神

65　李建民，〈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2003 年 8 期，頁 64-70。

66　關於此，我們從《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所載〈嘉祐補注總序〉、〈本草圖經序〉、〈開寶重定序〉、〈唐本序〉中就可以窺之端倪。請見（宋）唐慎微編著、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頁 1-5。

奇傳說視而不見？本文以為，鑑之蘇頌在編纂《本草圖經》時「事必稽古」的情狀，我們可能要從更大的背景思考，方能得其實際。

「知識存量」（Knowledge Stock），或許是個可資借鏡的觀點。這原是當代「企業管理」學門裡的一種概念，它意指社群結構中的所有知識的總和，是人們生產、生活與學習的積累，是一種巨集觀的概念。[67] 一般而言，企管學者認為「知識存量」具有反映社群知識生產狀況和創新能力的作用，並且在新知識介入或舊有知識加快折舊速率時會展現一定程度的波動性。[68] 本文以為，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傳統博物知識裡，之所以會存在許多既無法與實證經驗相對榫，但卻又可以長期存在，不被替換的認知，其主因就在「知識存量」的長期定型。

從「知識存量」來觀看古代本草文本裡的牛黃知識構成概況，蘇頌在十一世紀所展現的那種「事必稽古」的思考傾斜，其實早在六世紀陶弘景的筆下就已然流露。《本草經集注》一面陳述「盆水承生黃」的古典傳說，一面又說「今人多皆就膽中得之」，不正是蘇頌在處理新舊知見迴異時所標舉的「古今並存」的原則嗎？蘇敬也是一樣。他在《新修本草》裡，既說牛黃在肝膽，又說還是「喝迫得之」的「生黃」才是道地的牛黃。李時珍也是如此。這位明代的本草博物學家，雖然在親身的藥物調查與宋代史傳中總結出「黃為牛病」、「病在心及肝膽間」、「凡獸皆有黃」等結論，但他仍然對於「鞭牛取黃」的古老傳說不置一喙，並將其與他的「發明」同時並陳。

在「知識存量」的視野下，那種將彼此存在衝突的認知，不加通釋的擺在一起，未必就是一種愚昧或不科學。當下的經驗是這樣的，古來相傳的論述又是那樣的，而在現有的「知識存量」中既然找不到可資疏證的依據，那麼不論是擇新捨舊，又或是存舊而摒新，都會是一種偏頗、一種主觀。於是，最謹慎、最負責任的做法，無疑就是新舊並存了。換言之，如果一定要用今日的科學與否來加以陳述，古代本草博物學家對於牛黃的處理方式無寧是最科學的。[69] 這個存而不論，本身就是一種透過體例而凸顯質疑，「崇古」或「尊經」只能是它的皮毛，但卻絕非血肉。

67 李長玲，〈知識存量及其測度〉，《情報雜志》，2004 年 7 期，頁 65-66。楊志峰，〈知識資源、知識存量和知識流量：概念、特徵和測度〉，《科研管理》，2000 年 4 期，頁 105-111。李順才、鄒珊剛、常荔，〈知識存量與流量：內涵、特徵及其相關性分析〉，《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 年 4 期，頁 42-45。

68 李長玲，〈知識存量及其測度〉，《情報雜志》，頁 65-66。

69 關於此，晚近新作可參考陳昊，《身分敘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6-8 世紀中國的書籍秩序、為醫之體與醫學身分的浮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5-7。

本文以為，在面對傳統藥學文本中，像是「喝迫得生黃」這類的認知時，我們或許應該更謹慎的去知覺我們所處時代的「知識存量」，其實和陶弘景、蘇敬、蘇頌等古代本草博物之士有著偌大的差異。今日中國牛黃研究的突飛猛進，並非得力於傳統的「知識存量」；相反的，既有「存量」在前近代晚期所遭逢大波動，才是變遷與突破的主要動力。

五、結　論

如果單就圖繪而論，本非原創，且其所屬文本從未付梓流布，明代三幅寫本本草裡的牛黃藥圖，在藝術史上的價值或許要比其它史學領域高得多。然而，由於明代藥圖中所繪「嚇迫取生黃」的神奇傳說，早在六世紀時就在中國本草藥物學的「正典化」過程中顯現雛形，其後又在十一世紀的國家藥典裡具象為圖，因此我們乃得以求考其所蘊含的歷史意義。

當代的實證研究告訴我們，積澱在膽囊與膽管的牛黃，是不可能從消化道直接吐出來的。事實上，古人於此其實也不矇昧。且不說歷代藥學專著總是保留著「膽黃」的認知了，單看先民們每每有著「屠牛取黃」的舉措，就能覘見實況。問題在於，為什麼實證性的認知早就存在，且得到了權威性文本的一再認可，但無法驗證的神奇傳聞卻仍能盤踞相關認知的最高位，甚至還形成圖繪，成為標舉「道地」的象徵？本文因之以為，此中牽涉的其實是傳統本草學的知識構成方式。

古代藥學文本的體例旨趣是：經驗的確保與新知的添續。而在可以明確認定「今是昨非」的場合裡，這個體例也容許專家們的證誤。不過，對於本文而言，古代本草博物之士處理「古今異說」時所遵循的學術行規，同樣也是這個學門的重要知識構成方式之一。關於此，北宋時期的蘇頌，提供了極為關鍵的範式——此即在「事必稽古」的大原則下，無法疏證的新舊異說，是要被合併陳述的。

值得注意的是，「稽古」不等同於「崇古」或「尊經」。從「知識存量」的角度來看，在近代西學東漸以前，中國的「知識存量」始終長期處於一個相對持平穩定的狀態。換言之，當我們批評古代藥學家們徒知在前人經驗裡尋求今昔異說的通釋之道時，我們其實已然陷入一個「以今度古」的主觀偏頗裡。事實上，對於像是陶弘景、蘇敬、蘇頌、李時珍這樣的博物之士而言，他們之「稽古」，其實只是在既有的「知識存量」中尋求答案，而「古今並存」則是他們回應所處知識風土的惟

一選擇。與昔時相較，當代中國的牛黃知識，不論在研究或技術的哪一個層面，都無寧是趨近於圓滿的。只是這個圓滿的達成，並非中國傳統博物知識所能竟功。變遷，其實是得力於體質與中國既有知識傳統全然有別的西方學術門類。

藥圖當然不是藥學的全部，但這種以寫真為理想的圖繪，終究還是涵蘊了中國本草學術的知識格局，而本文據以探究古代藥學知識結構的邏輯基礎也在於此。最後，要加以說明的是，作為本文議題的牛黃，雖然只是一個案例，但它絕非孤例。事實上，具有相同體質的藥物素材還有很多，然而受限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詳述，只能留待日後再為文續論了。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宋）洪邁，《夷堅志》，涵芬樓藏版，臺北：明文書局，1994。

（宋）唐慎微編、郭君雙校注，《證類本草》，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

（宋）董弅，《閑燕常談》，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5。

（宋）鄭樵，《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

（宋）蘇頌編、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明）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臺北：世界書局，2014。

（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明）李時珍撰、陳貴廷通釋，《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

（明）劉文泰纂、曹暉校注，《本草品匯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明）劉文泰纂，王世昌等繪，《本草品彙精要》，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彩繪寫本。

（清）吳儀洛，《本草從新》，香港：上海印書館，1977。

（清）汪昂，謝觀、董豐培評校，《本草備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張秉誠，《本草便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8。

（清）曹雪芹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

（清）楊時泰，《本草述鉤元》，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1958。

近代論著

《股市動態分析》研究部，〈武漢健民：體外培植牛黃的王者〉，《股市動態分析》，2010 年 3 期，頁 39-40。

中國中醫藥資訊雜誌社，〈體外培育牛黃引起中藥企業關注〉，《中國中醫藥資訊雜誌》，2004 年 4 期，頁 302。

中國新藥雜志社，〈體外培育藥用牛黃的科技工作者——記中國藥學發展獎中藥獎獲得者蔡紅嬌教授〉，《中國新藥雜志》，2004 年 11 期，頁 1068。

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廣東省藥品檢驗所編著，《中國中藥材真偽鑒別圖典》，廣州：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孔增科，〈貴重中藥十年偽品概況〉，《時珍國藥研究》，1996 年 2 期，頁 122-125。

王春來，〈牛黃及其代用品概述〉，《實用中醫藥雜誌》，2010 年 10 期，頁 732-733。

王莉萍，〈體外培育牛黃研究概況〉，《醫藥導報》，2007 年 11 期，頁 1334-1336。

白書坪、蒲先琦，〈陝西省牛體培育牛黃的試驗研究與技術操作〉，《畜牧獸醫雜志》，1984 年 3 期，頁 4-7

何英，〈人工培植牛黃技術的現狀及展望〉，《黑龍江畜牧獸醫》，1990 年 11 期，頁 38-40。

李長玲，〈知識存量及其測度〉，《情報雜志》，2004 年 7 期，頁 65-66。

李建民，〈禁方書、聖人與正典〉，《讀書》，2003 年 8 期，頁 64-70。

李富育、余伯貴等，〈通江縣天然形成牛黃的調查報告〉，《中國獸醫雜誌》，1993 年 11 期，頁 23-25。

李順才、鄒珊剛、常荔，〈知識存量與流量：內涵、特徵及其相關性分析〉，《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 年 4 期，頁 42- 45。

邢振貴等，〈培育牛黃開發簡結〉，《內蒙古農牧學院學報》，1989 年 2 期，頁 80-88。

尚志鈞、林乾良、鄭金生著，《歷代中藥文獻精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林世琛，〈人工培植牛黃的研究動向〉，《青海畜牧獸醫雜志》，1987 年 1 期，頁 31-35。

林卡民，〈牛黃培殖實驗初報〉，《廣西農業科學》，1981 年 12 期，頁 40-42。

林如忠，〈牛黃的「人工培殖」與研究〉，《中藥材》，1980 年 3 期，頁 19-23。

武駿秀、喬景新、鄭洛、周玉，〈牛體培育牛黃試驗報告〉，《山西農業科學》，1983 年 9 期，頁 28-30。

唐廣文，〈提高人工培植牛黃產量和質量的探討〉，《中國獸醫雜志》，1988 年 11 期，頁 18-19。

唐德瑄，〈我們是怎樣合成牛黃的？〉，《上海中醫藥雜志》，1957 年 11 期，頁 12-14。

袁惠南、張啟明，〈我國牛體培植牛黃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科學通報》，1990 年 21 期，頁 1606-1607。

郝滿良，〈我國牛黃研究進展〉，《河北農業大學學報》，1994 年 2 期，頁 83-87。

馬成林、王振文、劉正民、田玉垚、唐瑞，〈牛的膽囊手術〉，《中國獸醫雜志》，1980 年 6 期，頁 34。

張啟明，〈開拓牛黃新資源的研究概況〉，《中醫藥資訊》，1990 年 4 期，頁 1-4。

曹暉，〈我國古代最後一部未刊藥典《本草品彙精要》的編纂及其外傳〉，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3-18。

曹暉，〈《本草品彙精要》之藥圖萬歷傳摹本《金石昆蟲草木狀》的考察〉，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728-731。

曹暉，〈《本草品彙精要》藥圖考察〉，收入曹暉校注，《本草品彙精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751-754。

陳昊，《身分敘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6-8 世紀中國的書籍秩序、為醫之體與醫學身

分的浮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陸基宗，〈牛黃及其三種代用品〉，《家庭中醫藥》，2008 年 3 期，頁 64。

賀春陽、范桂蘭、關紅、李培鋒、張福仁、馬蓓，〈天然牛黃與培育牛黃的掃描電鏡觀察〉，《藥學學報》，1988 年 12 期，頁 34。

楊志峰，〈知識資源、知識存量和知識流量：概念、特徵和測度〉，《科研管理》，2000 年 4 期，頁 105-111。

楊明珍，〈中國牛黃 43 年（1949-1992 年）研究動態〉，《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1996 年 1 期，頁 27-35。

楊洪武，〈人工牛黃的品質分析研究〉，《遼寧中醫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頁 50-51。

董建平、唐濟民、王積中，〈手術摘取人工培植牛黃 300 例的體會〉，《黃牛雜誌》，1994 年 71 期，頁 130；153-154。

董潤生、韓白石、郝明紅，〈人工牛黃新標準的實施與管理〉，《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1996 年 1 期，頁 51-53。

趙豔紅，〈牛黃及其代用品的藥理作用及臨床應用〉，《軍事醫學科學院院刊》，2007 年 2 期，頁 175-178。

劉振山、鄭玉泉，〈牛體人工培殖天然牛黃技術〉，《生物學雜誌》，1991 年 6 期，頁 23、30。

鄭金生，〈試談李時珍的本草考辨方法〉，《藥學通報》，1983 年 10 期，頁 7-11。

鄭金生，〈道地藥材的形成與發展Ⅰ〉，《中藥材》，1990 年 6 期，頁 39-40。

鄭金生，〈道地藥材的形成與發展Ⅱ〉，《中藥材》，1990 年 7 期，頁 43-45。

鄭金生，〈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發展的歷史必然〉，《中國中醫藥科技》，1994 年 3 期，頁 36-37。

鄭金生，〈明代畫家彩色本草插圖研究〉，《新史學》，14 卷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65-119。

鮮義坤，〈近年我國牛黃培殖概況〉，《特產研究》，1986 年 1 期，頁 15-18。

魏志傑，〈天然牛黃形成規律初探〉，《中國牛業科學》，1991 年 1 期，頁 71-72。

張曉松，〈何謂人工牛黃、培植牛黃和體外培育牛黃〉，《新華網》，2004 年 3 月 31 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62623d0100qmb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6 日。

西村正也、森良雄，〈漢藥「牛黃」の化學的組成に就て〉，《臨床獸醫學新報》，16 期，1940 年 5 月，頁 44-47。

志甫伝逸、高林昇、東宏俊，〈和漢薬成分の分析化學の研究（第 1 報）牛黃中のビリルビン複合體の定量について〉，《藥學雜誌》，83 卷 9 號，1963 年 9 月，頁 882-885。

岡西為人，《本草概說》，大阪：創元社，1977。

Appadurai, Arjun, eds.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圖版出處

圖 1　《金石昆蟲草木狀》「牛黃」，圖版取自（明）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臺北：世界書局，2014），頁 123。

圖 2　《本草品彙精要》（柏林本）「牛黃」，（明）劉文泰纂，王世昌等繪，《本草品彙精要》，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彩繪寫本。圖版取自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官網 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46157326&PHYSID=PHYS_2444&DMDID=DMDLOG_0033，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6 日。

圖 3　《食物本草》（宮廷寫本）「牛黃」，圖版取自（明）佚名，《宮廷寫本食物本草》，收入《中國本草全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卷 27，頁 412。

圖 4　《本草圖經》「牛黃」，圖版取自（宋）蘇頌編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 433。

The Production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al "Calculus Bovis (Niuhuang)" an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Involving Its Herbology

Chen, Yuan-peng
Department and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lassical record of the history of Niuhuang is a subject worthy of study, because, in the past, while the tales of Niuhuang were spread by the compendium of herbology, empirical knowledge about it had also been handed down by chroniclers in the medieval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in the professional texts of natural history, the traditional "divine" still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replaced by "reality."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the empirical example of the predecessor for "killing the cattle to take Niuhuang" had been widely spread, its illustr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book was still a drawing of "shouting at the cattle to get Niuhuang." This was based upon a long-standing natural recognition that one could make a sick cattle spit out Niuhuang by yelling at and whipping the poor animal.

Of course, pharmacy is not all about medicinal material images, but these kind of drawings made by natural portraiture still constitute a part of Chinese herbal science, and the logical basis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ncient pharmaceuticals case by case.

Keywords: Niuhuang, Chinese medicine, herbology, medic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圖 1　《金石昆蟲草木狀》　「牛黃」

圖 2　《本草品彙精要》（柏林本）　「牛黃」

圖 3　《食物草本》（宮廷寫本）　「牛黃」

圖 4　《草本圖經》　「牛黃」